

新锐出发

魏焯：小说最难的部分，恰恰在开始写作之前

本报记者 何焜

在小说里编造故事、扭转现实，对某些写作者而言是一种巨大的乐趣，《西湖》杂志2018年第四期的新锐魏焯正是如此。“我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我非常喜欢虚构。虚构的取材显得自由开放乃至混乱，小说涉及的经验漫布在作者人生的细碎角落里，藏匿在创作冲动之下，甚至构成创作冲动本身。”这一切吸引着他。

但魏焯的虚构并不是凭空想象，“无论你怎么虚构，都需要材料的支撑，而这些材料不可能先验存在于你的大脑里——要么是从你的生活中直接萃取，要么是对其他文本的二手转化”。他的所有作品都基于现实，尽管很少在作品里挪用现实经历，但大多会从生活经验里提取某个元素，构成小说的起点。现实经历提供了他小说创作的一个口子。

因为如此偏好故事情节的发展，甚至是叙述下去的某种动力，魏焯的小说常常在一些关键情节上反复推演甚至推倒重来，有时甚至不得不停下来重新思考方向性的问题。魏焯自陈，这一切的缘由只有一个——“在写作中探索未知的事情”。

记者：不妨从虚构谈起。你说自己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非常喜欢虚构，而你写小说的一个习惯则是只写想象出来的事情。这和很多基于生活经验的写作不同。为何是这样的？由此而来的一种担忧是，源于想象的写作何以持久？

魏焯：想象并不是空想，从我个人的认知来看，想象力是有很大局限的，经常会依赖已有的经验。只是我们平常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有所侧重，比如有些作家会用最切身的经验作为素材，甚至直接挪用记忆里的故事情节，让人可以从他的作品里直接窥测他的人生经历。这种写作侧重的就是经验。而侧重想象的写作，也只能从经验出发，只不过它更多的是去推导去试验，就好像我在打一个开放世界的游戏，我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玩法，而不是走过去触发一段剧情。它的优势在于未知，时常会有超出意料的惊喜；而缺点也在于未知，我可能会推导出自以为是的或索然无味的情节。

当然，你提到的担忧也是存在的。当我准备开启一篇新小说的时候，我往往得耗费大量时间，在脑子里做测试，就像爱迪生试灯泡的传说，试试这个元素有没有意思，那个人物能不能触动我，直到试出属于这篇故事的灯丝，然后天就亮了。至于说何以持久，就像我上面说的，再怎么想象也需要生活经验作为支点，毕竟灯丝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想要能够持续地尝试、持续地创作，那可能还需要收集更



魏焯

多的零件，这一点和注重经验的写作并没有太大区别。

记者：《西湖》上的三篇小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窥见你小说的一斑，尽管熟悉种种理论及小说技法，但你似乎不以结构、叙事的炫技为要，小说的面目清晰、直接、敞开，更多的是在情节设计、故事本身上着力。

魏焯：因为炫技其实并不炫。我所能想象到的所有结构、叙事上技巧，都是别人原创的，经过二三四五手的转用之后，流入到我手中。

但我不是否认结构叙事的重要性。巴尔扎克那一代就已经穷尽了所有情节套路，我们现在也是在不断重复，而重复的价值，在于你是否给套路注入了新的内容。结构和叙事也是如此，只要它能把内容本身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它就是有效的。换句话说，炫技本身是为内容服务的。就我目前所写的内容，我看不到玩结构和叙事的必要，直接简单的呈现反而要更真诚一点。

记者：何焜说你小说的两座桥梁是幽默和荒诞，《虚度七种》可能更明显一些，但可能《热垫圈》更有代表性，因为它显得更含蓄一些。换句话说，你是在看似正常的故事里暗藏着这些玄机，由此就更意味深长一些。

魏焯：应该说不仅是特质，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我写作的理由。就拿《热垫圈》来说，我之所以写这篇小说，就是因为经常听到人抱怨说冬天马桶圈太冷坐下去屁股凉飕飕，当时我就想，如果一个人早上起来坐到马桶圈上，发现马桶圈是热的，那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有意思，所以才有了写作它的冲动。接着我想到，这个人必须是独居者，否则一个热马桶说明不了什么。情节就开始向外延展了。

记者：这种幽默与荒诞之下，似乎隐隐有一种对人的生存的疑问，无论是《故居》里的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在网络发酵变异之下人被逼到绝境，还是《热垫圈》里的人的命运偶然性，或是《虚度七种》里直接显示的人如何虚度时间，你小说兴趣的落脚点似乎还是人的生存问题。这和你自身处境的思考是否也有关联？你想在小说里怎样解释人的生存本质？

魏焯：对我来讲，情节最根本的推动力，就是人的焦虑。我其实没有能力去写那种不痛不痒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我写小说的时候，人物必须处于强烈的焦虑当中，他必须遇到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很小（就像垫圈发热），但却直接牵扯到他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且坚硬的困境。而这个困境，很可能就直接来源于我自己的生活观察，比如说《故居》，它的直接来源就是互联网上弥漫的对于熊孩子的厌恶情绪，本来这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情绪，但在网络的煽动下无限放大。前段时间网上就有一些案例，有网友直接把网络上热传的那些对付熊孩子的方法付诸实现，结局可想而知。

但我得说，我并没有想在小说里面解释什么，这好像不应该是小说的功能。我之所以会写这些东西，纯粹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吸引人的，起码是吸引我的。看到一个小孩往文物马桶里撒尿，作为管理员的我应该怎么办？这个念头一浮现，我就立刻代入了进去，并处在这种持续不断的焦虑当中。之后所涉及的网络传媒等事物，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在小说里解释什么，我写小说，反而更像是在寻求一个解释。

记者：这三篇小说其实是你研究生时期的作品，虽然这个时间也没有过去多久，但你暂时没有新作了。当然小说写作的断续都很正常，却有一种感觉，似乎你并不是不想写，只是在探索未知的路途里还没有下一个目标。

魏焯：其实并不复杂，就是过了一段时间总要暂停，整理一下。过去创作比较随性，冒出什么点子就写，有时候并不太好的点子也会尽量完成它，好处是练了笔，坏处就是永远处在一个很不稳定的产出状态，作品时好时坏。我现在觉得有必要沉淀一下，稍微在前期准备上下功夫，给自己摸索和建构一套稳定有效的写作思维方式。最基本的，就是如何寻找点子，如何判断一个点子能否诱发一个相对完整成熟的故事。我不想或者说擅长直接挪用人生经验，所以有时候一篇小说最难的部分，恰恰在开始写作之前。

本栏目与《西湖》杂志合办

短评

何焜

得益于室友关系，魏焯跟我在之间，发生过不止一次关于小说的对话。

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感谢读研为我们赢得的这段时间，一段似乎只为了写作、阅读、讨论而存在的时间，不受外界事务的侵扰、因其纯粹而注定要在生命中留下印记的时间。已经记不清我们一起讨论过哪些电影了，它们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区间带，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时刻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滋养，它们经常在讨论中被魏焯拿来与小说作类比，在

他那里，纯文学与类型文学，商业电影与文艺电影，不需要被彻底地二元划分。

这正是为什么，你会在阅读魏焯这三篇小说的过程中感受到某种混杂的气质。毫无疑问，《故居》、《热垫圈》可以归为一类，《虚度七种》属于另一个阵营。幽默是连通他两个小说阵营的一座桥，而荒诞则是另一座。《虚度七种》里的七个故事不是充满细节的生活事实，是简化过后的生存样本，却是对荒诞性的高度提纯，带着对20世纪“发现非理性的哲学”的嘲弄，一些

人名、著作名还有真实存在的组织、游戏被变形放置其中，虚实交错，一本正经却又荒诞不经，但在审读过后，它们最终无疑指向了这样一个方向：在难以把握、难以理解的世界面前，肯定行动的意义。

回头去看魏焯这一系列作品，我觉察到，我们终究需要依靠小说、依靠写作、依靠持续不断的输入和输出，找到在这个无法跳出的世界里自己的位置。这或许是对无意识地弥散在这三篇小说里的生存疑问的回答：继续阅读、行动，那种属于自己的力量终将形成。

“《静夜思》《鹅》《春晓》……这些诗是儿童接触诗教的第一窗口，对孩子来说，它们的音韵朗朗上口，背起来顺溜好玩，但这些诗到底为什么好呢？又为什么要读诗呢？则需要‘我们’也就是家长和儿童共同探索。”6月3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做客志达书店，从多首具体诗篇入手，以讲故事的形式，和小读者们一起读诗。

“在诗歌这一由语言所构拟的空间里，我们有另外一种样态的生存。诗固然取材于生活，却更多地体现着人性中美好的向往，人情中美妙的趣味。简单地说，诗总是在追寻生命的完美的可能性，并以最精致的语言形态来呈现它。在诗的世界里，生命以优美的姿态自由地舒展。”骆玉明认为读诗陶冶性情，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童谣阶段，牙牙学语的孩子完全不懂诗歌的意思，摇头晃脑地跟着音律背诵起来，大多源于孩童的好奇心；到了第二阶段，孩子逐渐长大，觉得再如小时候那般背诗有些幼稚，他们不再满足于天真、童趣式的快乐，此时，就进入感受诗歌的情感美和语言美的阶段。“家长要加入进去，自己要对诗歌产生兴趣，和孩子一起体会诗歌中的共同情感，将诗内化为知识结构，成为人格、审美养成的一部分。家长更应懂得择诗，以讲故事的形式传递给孩子诗歌的美。”同时，他指出现代古典文学教育存在的一个问题，比如家长把孩子一股脑送去培训机构，而文学教育高涨的市场需求使得教育培训机构所承担的教育功能本身带有双重性，有人将其视为完全的生意，文学教育又绝不能完全受市场牵制，它需要怀着责任感与良心的人去从事。“当我们变得成熟直至面对死亡，我们需要把一首具体的诗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背景中去理解。大自然处于无限的循环中，所谓春花秋月何时了，人本来也处于循环中，可人一旦有了自觉性，就从无限循环中跳脱出来，会老，会死。这就是读诗的第三阶段，小朋友目前不会理解，我们成人之后才会思考死亡对于人的生命的终极意义。因为儿童以童真的眼睛看待世界，儿童的世界色彩丰富，而诗可以让这份丰富变得更深更远。”

不同于西方的诗学理念，中国人历来重视诗歌对人的精神养成作用。而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诗歌教育大多以语文课本中零碎的诗篇存在，市面上的一些诗歌读本又多以主题式或低幼版本出版。为此，同济大学教授刘强携手骆玉明共同主编了“中华少儿诗教亲子读本”丛书，该套丛书共11本，以《诗经》《楚辞》、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等七个段落，系统反映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将现代、当代、外国诗歌与中外童诗作为重要焦点，以时空交织的形式，多元地展示中外诗歌的交流、互动及演变历程。“我们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通过对古今、中一外经典诗歌作品的系统梳理，甚至以大学的知识结构要求，精选出适合7—18岁孩子学习和‘亲子共读’的诗歌作品近千首，加以整理和导读，使广大青少年读者对古今、中外的诗歌发展史、诗人、流派、佳作等有一个相对全面的把握，对古今诗歌的艺术创造过程有一个相对深切的体会，也对诗歌的现状与未来有一个基本的审美观照与憧憬。”刘强介绍丛书的特色。

除了丛书之外，同济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和同济大学出版社还将在一年内陆续举办12期提倡“亲子悦读”、以古今中外不同时期经典诗歌的导读为主题的讲座。本期讲座正是系列讲座的第一期。

骆玉明：诗歌不止于童谣

见习记者 袁欢